



大鳳凰 新批评文丛  
总体策划：陈思和王晓明

# 季节轮换

Li Zhensheng Zhu

李振声 著

既然文学批评注定要担当起人类感性和情绪记忆以及不断反刍和回味这种记忆的职责，那么，我给我自己派定的任务就是，把往事理出个头绪来，仔细探讨一种诗学趣味发生、形成以及几经

流变的需要的内在原因和外部条件，弄清楚作为

一段时代的感性和精神生活的见证，「第三代」诗在精神、

心理和感知方式等诸多方面，

所表现出来的应变能力

和承受能力，从而为观察一段历史、

一段文化的变迁，理解社会和

个人的想象和经验特性，

提供一种角度。

季节 轮换

206.7  
06

出版  
社

学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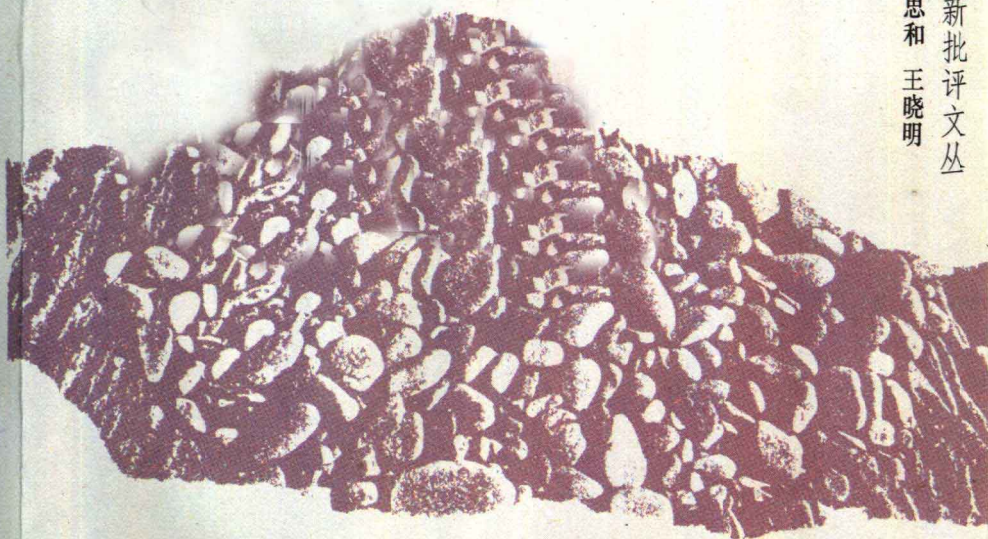


火鳳凰 新批评文丛

总体策划：陈思和王晓明

# 季节 轮换

Li Zhensheng Zhu  
李振声 著



学林出版社

---

(沪)新登字113号

总体策划 陈思和 王晓明

责任编辑 李 东

扉页题字 巴 金

装帧设计 王晓阳

书 名 季节轮换(“火凤凰”新批评文丛)

作 者 李振声

出 版 学林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文庙路120号

火凤凰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经 销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丹阳兴华印刷厂

版 次 199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规 格 850×1168 1/32

印 张 8

字 数 176,000

国际书号 ISBN 7-80616-191-0/I·70

定 价 11.00 元

## 总 序

徐俊西

思和有一天突然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已得某企业家朋友的一笔赞助,准备建立基金出一套青年文艺批评家丛书,并要我写篇短序。高兴之余,只得从命。

据云,他们编辑《“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的宗旨有二:一曰在“滔滔的商海之上”,建立一片文学批评的“绿洲”;一曰在“文坛空气普遍沉闷的状况下”,弘扬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这无论从哪一点来说,他和他的朋友们的这种真诚和抱负,都是值得尊重和赞赏的。

首先,在当前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人文科学确是首当其冲的。所谓文人下海,学术消沉,大腕横行,士将不士,着实引起人们普遍的不安和忧虑。然而仔细一想,事情也并非果真这样糟。从大处着眼或长远一点看,经济搞上去了,文化迟早也一定会上去的。就譬如“火凤凰”这套丛书的出版,如果没有经济大潮,就没有那么多的企业家;没有那么多的企业家,哪有人出钱赞助出版。所以我总觉得,当前的文人学士对于刚刚出现的市场经济中那些不利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也不要过于大惊小怪。这里除了加强自身的修养,做到“坐怀不乱”外,还要以一种“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宽松心态

来看取繁华人生，相信在商海的沉浮中能够到达彼岸的除了物质文明之外，也必定会有人类的精神文明，重要的是我们大家要下定决心，采取种种有效的方式游过去。

其次，所谓弘扬人文精神的问题，要言之，就是要弘扬人们在研究人文科学中长期形成的那种追求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睿智的科学态度和崇高的献身精神。大家知道，从真正宏观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当今世界人类的生存状态和价值实现还仍处在极不完善的初始阶段，正像恩格斯所说，若干年后，我们的后人指出我们的错误一定会比我们指出前人的错误更多得多。因此，对于研究人文科学的人来说，实在是任重而道远，如果没有一种坚韧不拔的治学精神，是很难胜任的。而且不仅如此，由于他们始终把自己研究的坐标定位于人类价值的最终实现上，因而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要以批判的和超越的目光来审视现实，构想未来已成为他们的思维定势和理论特征。不言而喻，这种定势和特征在“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现实生活中所需要的自知之明和社会宽容将是何等的重要和突出！别的姑且勿论，就以这套旨在“发扬上海地区文学批评优势”的丛书来说，作者们所崇尚的新批评的美学观和方法论在我国当今的文坛上究竟能获得多少知音就很难逆料，更不用说要得到其他各界人等的认同和接受了。但是不管怎样，在当前日现荒疏和浮躁的文艺批评领域里，有一群甘于寂寞的青年学子坚守岗位，不惮驰驱，并大有筚路蓝缕，继往开来的气度，这就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了。

以上就是我由这套丛书所引发的一点感想和议论，言不及义，是谓之序。

## 主题绪言：范围，将要克服的困难，方法

“第三代”<sup>①</sup>诗，泛指“朦胧”诗之后的青年实验性诗潮。

这段诗歌经验，是共和国诗史上变化最为激烈、频繁，投入者最为众多（除开1958年政治号召下的那场“全民皆诗”的“新民歌运动”），最容易令人入迷，也因此最容易使人感到困惑乃至失望的一段经历，其涵盖幅度异常广泛，品类也相当芜杂。

“第三代”诗，又称“新生代”诗、“后新诗潮”和“后北岛诗群”等等，对同一诗歌现象的不同命名，表明了命名者在思想、文化、价值和美学等取向上各自不同的侧重面。就像尾注所表明的那样，我选取“第三代”这一命名，只是顺从了一部分身临其境、直接置身其间的诗人们的意愿，我比较相信“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说法，这就是我为什么选择诗人们的自我命名的理由。

从宽泛的意义上说，离开“朦胧”诗之后的杨炼和江河所开启的“文化寻根”诗，也应当包括在“第三代”这一范围之内，成为我要述及的对象和内容之一，然而，由于“文化寻

根”诗实际上与在其之后相继涌流的、实验意欲远为激进的诗歌思潮相比，在对待诸如文化、价值、意义以及个性的态度上，以及具体的致思方式和抒写手段上，存在着十分明显的歧异，因而，严格地说来，“文化寻根”诗其实只是介于“朦胧”诗和“第三代”诗之间的一个过渡层，也就是说，“文化寻根”诗之后的各种实验性诗歌现象，才是我想着力论述的对象和内容。在本能的、无意识层面上，“第三代”诗的各种激进意向，实际上都是直接针对“文化寻根”诗的价值取向和抒写方式所作出的反拨和拒绝，但是在有意识的层面上，“第三代”诗却更多地对“朦胧”诗耿耿于怀、频频发难并采取一种强烈的对抗姿态，这其中的原因则是基于一种自我认同上的压抑以及试图努力摆脱这种压抑，由此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化心理现象中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

虽然“第三代”诗最先是以“朦胧”诗时代和“北岛现象”的反叛者和终结者的姿态出现的，但我们仍需加以注意的是，这种反叛和所要终结的对象，仅仅是作为一种特定文化和文学现象的“朦胧”诗和“北岛现象”，作为诗人，北岛们至今仍在作着诗的深入和转换的努力，继续着诗的实验性抒写，即，他们自己也已经纷纷走出了“朦胧”诗时代，这种情况构成了中国当代诗歌复杂、并存而又意味深长的格局，就此而言，现在要来宣布他们中间谁谁谁已经与诗的当代性无缘，或者反过来，宣称当代诗的自觉意识和抒写只是属于某些人的专利，都不能不显得为时过早和证据不足。诗以简洁有力而又激动人心的词语、观念表述自己的时候，它能够感动每一个人，但是，对诗的那种自觉的、深入的、更为简洁有力、切入真实的企求却是永不会完结的，因而诗永远需要重新开始，永远需要把它当作一个持续不断的智慧的成长去企求。这一事实，已经不断为那些具备真正精神创造力的

诗人所证实,并且也为稍次一些的诗人所仿效。对“朦胧”诗,北岛、舒婷一代是如此,对晚起新进的“第三代”诗作者来说,情况依然如此。

如果说“朦胧”诗面对的是作为极左政治文化附庸物存在的一种诗的废墟,那么“第三代”所面对的却是新中国诗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并且直接构成“第三代”精神智慧启导人的“朦胧”诗,以及“朦胧”诗人苦心经营建构而成的一整套完整、稳定的诗思规范。比起它的启蒙者和反叛对象,这种境况要求“第三代”拥有更为强有力的撞击传统和陈规的冲力,更为彻底地吸收现实生活的欲望,以及更为严峻地面对并应答诗的创造性问题。而由此导致的过于激进的变更姿态和过于强烈的震撼度,便注定了这段诗歌的命运:它们被接受、被认同,以及获得积极的反应,要远比“朦胧”诗来得困难。

另一种情况则表明,思想文化的生存背景,又对“第三代”诗格外恩惠有加。“朦胧”诗的生成环境是一个充满了忧患和压抑的思想文化空间,“第三代”遇到的却是相对开放宽松的思想文化氛围。“第三代”诗人的相同之处,是在于他们都受到了当时普遍的时代思潮的鼓动、怂恿和推涌,而他们弃绝权威的躁动,同时又构成和强化了这个时代的思潮氛围,他们的不同之处,则在于他们每个人对待共同面临的时代思潮时,各自不相同的诗思素质、心理准备和特殊的处理手段。与“朦胧”诗人生成于忧患、压抑的环境之下的那种深幽、拘谨的文化性格绝然不同,“第三代”诗人普遍地为一种自由感所鼓舞,为数甚众者还身不由己地将这种鼓动自己的自由感推向极端,由此导致了一种过于繁杂并且多变的精神生存形态,即企图从世界的各种(而不是一种或几种)角度和层面去理解和处置世界的意欲,在他们身上表现得



格外强烈和充分，而诗歌的表现形式总是与诗人的精神生存形态呈同构关系，与精神生存形态的繁杂多变相对应，在诗歌形式的建构上，他们深信无疑，自己业已摆脱了旧的观念和手法的限制，无须再受那些束缚前代诗人的东西的束缚，因而尽可以自由地使用他兴之所至想用的任何方法和材料，谁也无权干涉他的意愿，只要他想，他就能设法做到，他甚至拥有不受可能性限制的实验特权，在1985、86、87这些年头，恨不得一夜之间穷尽诗歌形式的所有可能性，曾经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风气。

这样，通常的研究惯例很容易在它面前搁浅，因为这种惯例要求研究者始终清醒地意识到对象的整体精神特征及其风范等等，然而，想在“第三代”身上概括整体精神特征及其风范的做法，某种程度上近于想象性虚构，因为这一想法从根本上背离了这一实验性诗潮的初衷和本意。被笼统纳入这一范围的诗人及其作品，在开拓诗的言词模式、诗的感觉、想象、情感、理智等诸多状态的可能性上，拥有几乎无法加以归纳、梳理的众多向度，彼此少有衔接、贯通，甚至自身也很少保持一贯性，他们从根性上就拒绝以一种给世界以秩序的思想体系作为诗的支撑点的做法，一切听命于有意为之的反叛和独创，向迄今为止包括同代人在内的所有中国诗歌宣告自己的独立，以致一种前后一贯的相对完整和稳定的诗歌表达模式往往与他们无缘。

干脆点说吧，不确定或晦涩难解，构成了“第三代”诗的基本品格。人们究竟应该采用哪种合适的读解方法，才能走近它呢？这至今仍是一个远未解决的问题。事实上，“第三代”诗还从来没有能够确立起一套可以为人们所公认或普遍接受的认知规范，以便供人们得心应手地处理它所提供的那个众声喧哗的世界，它还远远没有成熟到那个份儿，这似乎是它的一个弱点，因为这

样一来,无疑给人们阅读、交流和明察其作为整体和过程的意义带来种种障碍和不便,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这可能又是它的一个长处,正因为这样,“第三代”诗得以保全了自己无限开放的实验精神,并且有可能成为不断刺激诗学研究和批评有所拓展的动力源,因为它不再是那种只需研究者凭藉现成的思路、范畴和概念,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作出概括和得出结论的那种诗了。在很大的程度上,对它们的阅读,同时也变成了一种阅读者自我理解的行为,因为阅读者自身专心关注的耐力,他面对诗作所可能引发和唤起的复杂感悟能力,他的想象力,以及参透内核的阐释能力,都将在这里一一接受测试和重新评价。

极端的个人意识,以个人的取向作为价值的直接根据,诸如此类的世界观,加上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的诗学追求和私人人性很强的诗风,使得“第三代”从根本上缺乏一个可以整合、统摄群伦的、具有权威性的中心,有的只是各自为政、自以为是和分立割据的局面。他们在诗学和文化情绪等各个方面存在着矛盾和差异,只是在反叛既成秩序、逃离既成权力话语这一不约而同的精神冲动之下,暂时纠合成一种松散的伙伴关系。考虑到“第三代”诗人对精神个体性怀有顽强得甚至走向极端的坚持,因而,即使在对“第三代”中某种具有群体性状的诗现象和诗经验作出勾勒和综合性阐释、评述的时候,我也将优先考虑对诗人个体性实验轨迹的关注和追踪,侧重诗作者个体性抒写的用意及其效应,包括对某些形式的功能测定及审美反应的分析、描述和适度的联想。

与此前的诗歌现象相比较,还有一个不小的差异,那就是,“第三代”诗人大多善言好辩,相当普遍地在抒写诗作的同时,亟不可待地向外人张露他们的理论构想和目标设定,这种自

觉制作诗学理论的勇气，一半也许的确是出于思考和探讨的纯正冲动，一半则显然是出于哗众取宠和自我夸大的功利打算，旨在使反对者大惑不解，以及吸引追随者。因此，我的选择性描述和叙论，只能坚持以诗作本身，而不是诗论、宣言所标榜的它能代表的目标，来作为基本和最终的依据，也就是说，是以它们的实际存在状况来判断，而不是把评论寓于预定假说的完善之中。在探讨和处理设想和行动、或言词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时，我宁肯把兴趣的重心偏向这两组关系的后半部分因子身上，因为我更看重的是“第三代”诗在这两对组合因子中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的裂隙。

为了急于摆脱传统和已有的经验框架给自己造成的无所不在的心理压力，“第三代”诗人们努力鼓吹原创性和独特性的绝对意义，断然否认经验和实验存在任何边界。他们向他们之前的诗提出的最难加以反驳的质问是：这是否就是一切？如果是，那么这些诗就足够了吗？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征服这种青年实验诗现象的，不再是他们的前代所熟习和亲验过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独断专行，而是不断“创新”这一标牌和口号，“创新”为全体“第三代”诗人所摄服，力量之大，致使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有勇气和胆量去对它提出怀疑乃至弃绝，这样，异化的迹象便出现了，一种本来是追求生命自由舒展的初衷或愿望，在无形之中，悄悄变质为一种你不得不循守的行为规范。与此同时，刷新意识、寻觅新奇的骚动激情，导致了不稳定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到处泛滥，一种新形成的东西往往还等不到固定下来或沉淀一下，就马上陈旧了，有如沙滩上的足印，浪涛打来便荡然无存。昨日还在尊奉为“先锋”的感受和思想方式，说不定睡了一夜之后就成为了过时的历史陈迹。独创和实验的轴心原则就是要砍断、

丢弃过去的经验，再造自我。今日之我不复昨日之我，明日之我又非今日之我，自我失去了连贯、接续和统一的人格整体性质，一时间成了彼此断裂、分离、脱节，丧失了自信和自持，听任无休无止的偶然和随机所驱役的存在物。身不由己地听任内在连续性遭受破坏，悍然断弃自己走过来的路，不允许已有的经验接近自己、支持和拯救自己，这一切需要承受多么大的心理痛苦呵！事实上，资质一般的人最终是承受不了这种痛苦的，即使你可以承受一阵子，那时间也不可能坚持得太长。

人类处境的有限性，这恐怕是现代思想家和文学家们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了，“第三代”诗人的想象力、精神能量以及可供他使用的经验、意象总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个事实对于他们在创新实验欲望上的无限制的、无休止的冲动，构成了一种宿命的限定，由此产生的生存中的无能为力感，又将导致一种厌烦和倦怠的心理状态。在日常生活中，情况常会这样，既然一个人不能改变任何事物，他就自然而然会放弃当初的预期和设计。

了解了诸如此类的情况之后，我们就大可不必对“第三代”诗在不多的几年功夫之后就显得难以为继，力不从心，以及“第三代”诗人的纷纷消声匿迹或改道更辙，感到难以理喻和过度的失望、沮丧了。

不管怎么说，“第三代”诗业已构成了中国当代(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一段感性历史的不可忽略的部分，既然文学批评注定要担当起人类感性和情绪记忆以及不断反刍和回味这种记忆的职责，那么，我给我自己派定的任务就是，把往事理出个头绪来，重溯“第三代”诗的流程，仔细探讨一种诗学趣味发生、形成以及几经流变所需要的内在原因和外部条件，弄清楚作为一段时代的感性和精神生活见证的“第三代”诗，在精神、心理和感知

方式等诸多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应变能力和承受能力，从而为观察一段历史、一段文化的变迁，理解社会和个人的想象感知方式和经验特性，提供一种角度。我希望整个情形就像自然季节转换的时候，一个手持竹帚的扫叶人在庭园或路旁，静静地、慢慢地清理一茬茬落叶一样。

水落石出，山高月小，随时间的自然推移，当初充满喧哗和骚动的潮汐涌动已经渐归平静，一种激荡之余的沉淀已经形成，在浮躁和虚妄纷纷剥落之后，“第三代”中那些有着坚实内在性的诗人和显出某种内在精神智慧的诗作，正在开始得以清晰显现出来，这正是批评和研究开始自己的工作的好时机，我想，我错过的东西已经够多的了，我不想再错过这样的机会了。

#### 注释：

- ① 本书的“第三代”概念来源于《第三代诗会》题记：“随共和国旗帜升起的为第一代，十年铸造了第二代，在大时代的广阔背景下，诞生了我们——第三代人。”（《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1985年第1期第32页，四川省东方文化研究学会、整体主义研究学会主办）



## 目 录

|     |                                        |
|-----|----------------------------------------|
| 1   | 主题绪言: 范围, 将要克服的困难, 方式                  |
| 1   | 第一章 “寻根”(上): 价值城堡的重建或虚构                |
| 18  | 第二章 “寻根”(下): 价值城堡的拆解                   |
| 34  | 第三章 另一种向度: 无需依傍或让每一个人自己<br>成为一种文化和意义源头 |
| 48  | 第四章 诗意的放逐与收复: “他们”与“莽汉”现象              |
| 70  | 第五章 构筑诗的巴别塔: “非非”现象                    |
| 94  | 第六章 “夕阳下的家园”: 一群深度抒情者                  |
| 168 | 第七章 智者之虑                               |
| 198 | 第八章 既成言路的断裂                            |
| 216 | 第九章 女性诗歌: 人物与风景                        |
| 234 | 简单的结语                                  |
| 239 | 后记                                     |

## 第一章 “寻根”(上): 价值城堡的 重建或虚构

任何歌唱的学派,都在研读  
纪念碑上记载的它自己的辉煌,因此我远渡重洋,  
来到  
拜占庭这座神圣的城堡

叶芝《驰向拜占庭》

……一天,我发现自己不是前进,而是返回了出发地:对现代性的寻找是一种返本归原。现代性把我引向了我的开始,我的古代。决裂变成了和解。于是我明白了,诗人原是世代之河中的一种搏动。

奥克塔维奥·帕斯《对现时的寻求》

在“朦胧”诗和“第三代”诗之间,或者说,在反叛者和它

所反叛的对象之间，横亘有一个过渡性的中介层面。由于这一层面发生在“朦胧”诗之后，所以从时间上着眼，不妨把它归属进广义上的“第三代”的范围，但实际上，它与严格意义上的“第三代”的歧异和裂隙之大，不亚于“第三代”之于“朦胧”诗，这些留待后文述及。这一层面的诗歌现象，简括地说，可以参照当代小说思潮上的一个说法，命名它为“文化寻根”诗。只是需要注明，“文化寻根”现象的发生，在诗歌里要比小说中来得早。阿城的《棋王》发表于1984年下半年度。同年初冬，在杭州，阿城、韩少功、李杭育们和一批当时出名的青年批评家一起参加了一个小说讨论会，会上，“文化”和“寻根”成为最吸引人的话题之一。第二年春天，韩少功在《作家》这本在今天已倍受锐进的作家和批评家喜爱、而在当时正刚刚改刊、还不怎么惹人眼目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文学的“根”在哪里？》一文，正式打出小说“文化寻根”的旗号，“绚丽的楚文化到底流到哪里去了？”这一表明小说家对民族文化精神返本求源意欲的反问句，一时不胫而走。在诗界，杨炼以古文化作为主题和背景的半坡组诗，1982年即已写成，到1984年，他已相继写出摹拟《易经》思维结构的庞大、繁杂的《自在者说》。诗的“寻根”和小说的“寻根”，时差至少为两年。

当我们说“朦胧”诗起步于一片文化废墟的时候，同时就意味着“朦胧”诗起始于一种深刻的悖论。有过那一段时代生活经验的人都将记忆犹新，我们曾经怎样以一个绝对权威所发出的鼓舞人心的绝对命令作为自己唯一的生存根据，对这权威的信仰和忠诚成为我们生活意义的根源，并且使得我们不必为了自身而去追寻探究任何问题。但是，当这个权威不再是成功的权威，人们对之情不由己地发生怀疑时，一种毁灭性的虚无也就随

之产生了。一方面,对那种强加于人的,曾经造成亿万百姓物质和精神双重灾难的价值体系,加以严正的舍弃和拒绝,就有了正当的无可怀疑的理由,这一境况由北岛们用“我不相信”这类悲愤而又雄辩的句式所表达;另一方面,对现存价值系统的断弃;又意味着个人由此将面临一种无处着落、无所归宿的处境,唯一能够使人逃避这种悲苦处境的,是人必须以个体的身份去占据那可以作为他的各种决断基础的真实存在。每个人和每个社会一样,都需要设法确立一套意义价值范式,以便经由它理解一个人的自我,一个人的民族、历史,以及一个人在社会、世界和事物格局中的地位,解决精神寄托和自我反省、情感沟通和文化绵延等诸多生存问题,并且使得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得到一份合理的解释,获得一种得其所哉的踏实和安宁感,从而确保行动不再是盲目的和反复无常的。但是,要求现在突然变得孤立无援的个人去承担起在文化荒原上重建人类精神价值支柱的使命,显然是一桩勉为其难的事情。人一旦置身在荒原之中,才会真正痛切地意识到世界的荒凉和自身的无力。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较为折衷和可行的做法,就是急切需要设法找出一个既可靠又现成的实体,来作为暂时的支撑和立足点,以便填补人们仿佛一时被从中掏空了的那种价值虚脱,并用来应付重建新的价值体系所需要的时间上和心理上的准备。

这样,沉迷于经典的破译,复活和重现古老的岁月和种族生命,将先民们遭遇过的苦难连同他们的真诚或愚妄的信念,一起加以神圣化的处理,返身投入种族集体生命经验的渊薮之中,从而把一时漂泊无根的精神,引渡到种族信念的源头去安家落户,就成为一种别无选择下的选择,一种可以理解和宽谅的冲动。我们在接受这种也许是极为一厢情愿的、极为主观的重建历史、重